

琉球的出版文化與琉球漢詩集

高津孝

提 要

琉球王國久米村人，系明朝由福建移居琉球的華人後裔。歷史上，久米村人一直承擔著琉球與中國的貿易和外交往來；琉球漢詩的創作與出版也主要出自久米村人之手。琉球人創作的詩集，在中國的北京和福州，以及日本的京都、江戶和大阪均有出版。¹ 本文在琉球的出版文化這一場域中，對久米村人的出版活動，尤其是漢詩集的出版情況進行考察，並確認和評估其在東亞海域文化交流中的歷史意義。

關鍵詞：琉球 出版文化 士族教養 漢詩集

一、前 言

在中國，自 8 世紀左右發明印刷術以後，經宋代印刷文化的長足發展，到明清時期，便已進入刊本時代，即書籍出版均採用印刷方式。但中國以外的各個地區依然處於寫本刊本並存的狀態。當然，各個地區之間也不盡相同。印刷技術的傳播，並未給各個地區帶來均等劃一的刊本文化。譬如在日本和琉球，既

¹ 江戶時代之前一般作“大坂”，明治時代以後通作“大阪”。

有刊本文化的長足發展,同時又保存了豐富的寫本文化傳統。日本各地以及沖繩的諸多圖書館裏,既能看到諸多江戶時代出版的刊本,也收藏著大量不同時代的寫本以及手寫文書。我們需要重新考量,在社會存在的整體格局中,雕板印刷技術究竟具有哪些意義。毫無疑問,印刷技術是人類歷史中非常重要的文化發明,但這並不等於它對每一個社會的意義都是均等的。技術是在與社會的相互作用中產生意義,印刷技術的傳播和普及也不例外。

近世琉球通過薩摩(今鹿兒島縣)全面採用了江戶時代日本的行政文書系統,²即以寫本為核心的文書系統。在文書文化這一點上,近世琉球承接了近世日本的寫本文化,屬於寫本文化社會。在沖繩的許多島嶼,至今仍保存著數量龐大、以江戶時代通行的“御家流”這一和式草書體書寫的行政文書。要理解近世琉球文化,不能僅僅依靠寫本或是漢籍版本,而必須兼顧寫本和刊本的相互關聯。

有關琉球書籍出版情況的記述,最早見於中國人。清朝時期有一位負責琉球留學生教育的官員叫潘相,他在《琉球入學見聞錄》一書中有過詳細記述。該書四卷(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刊本)“卷二書籍”條曰:

國王、先後刊有《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集解便蒙詳說》、《古文真寶》、《千家詩》。板藏王府、陳請即得。(中略)白文小注之旁、皆有鈎挑旁記。本系鐫刻、非讀時用筆添注。

《四書》外簽有文字訓點四字。《論語·為政》卷之末有聖像。上橫額云“萬古儒宗”。(中略)前題“至聖孔子像”、後題“後學余象珍贊”。(中略)(《孟子》)《萬章》卷之末又有一像。上橫額云“余明台刻行”。(中略)几案上有《大魁四書》。(中略)臣按:官生等皆云《四書》刻於尚真王、在明正德之時。(中略)似內地有此本、而球人依仿刻之、特旁添球字者。

2 指介於中世和近代之間的歷史時期。一般指封建時代後期的江戶時代,即17世紀初至19世紀60年代。

僅看這段文字，我們無法判斷文中提到的這些書，究竟是日本的和刻本，還是琉球版刻本。“鈎挑、旁記”似指和刻本的讀音順序符號及送假名。下邊一段所說刻本，即大魁本《四書集注》，原為明末福建建陽書肆余明台刊本之復刻，³由薩摩文之玄昌訓點，其弟子泊如竹於寬永二年（1625）在京都刊行，屬和刻本系統。寬永九年尙育王時期，泊如竹將大魁本《四書集注》傳入琉球，成為琉球官方認可的刻本，一直使用到 1872 年日本明治政府將琉球納入日本版圖為止。潘相似將此版本當成琉球版，又將訓點的假名文字誤認為“球字”（琉球文字）。另一種可能則是，琉球方面為了維持琉球與清朝的朝貢貿易關係，故意隱瞞了琉球已被納入薩摩統治之下的事實，從而把在琉球使用的各種和刻本書籍說成是琉球刻本也未可知。這一資料為人們提供了當時琉球高級知識分子使用漢籍的信息，儘管這些書籍究竟出版於何處還不甚明瞭。

二、關於“琉球版”

在談論琉球出版文化時，如何為“琉球版”定義是件難事。如果指在琉球製作雕版並印刷出版的刊本而言，那麼現在已知的琉球版就只有上述五種，另加在琉球製作的中國曆書或琉球曆書。自 1665 年以後，琉球每年均刊行琉球曆書，現存者如下：

（1）（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 寫本 國立國會圖書館 一冊
十八葉⁴（以往僅有寫本，有關琉球曆的研究也以寫本為依據）

（2）（大清道光十二年）選日通書一卷 道光十二年刊本（琉球） 一

3 參見高津孝：《博物學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海域交流》（沖繩：榕樹書林，2010 年），第 2 部第 2 章，頁 160—177。

4 大谷光男：《時憲曆の曆注について（琉球）——大清乾隆二十七年選日通書（國立國會圖書館藏）》，載小林春樹編：《東アジアの天文・曆學に關する多角的研究》（東京都：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2001 年），頁 121—154。

葉 上江洲家文書

- (3) (大清咸豐四年) 選日通書一卷 咸豐四年刊本(琉球) 一冊
上江洲家文書(表紙墨書“大極圖”)
- (4) (大清咸豐五年) 選日通書一卷 咸豐五年刊本(琉球) 一冊
上江洲家文書
- (5) (大清同治四年) 選日通書一卷 同治四年刊本(琉球) 一冊
上江洲家文書
- (6) (大清同治六年) 選日通書一卷 同治六年刊本(琉球) 一冊
上江洲家文書
- (7) (大清同治八年) 選日通書一卷 同治八年刊本(琉球) 一冊
上江洲家文書
- (8) (大清同治九年) 選日通書一卷 同治九年刊本(琉球) 一冊
上江洲家文書
- (9) (大清同治十年) 選日通書一卷 同治十年刊本(琉球) 一冊
上江洲家文書
- (10) (大清同治十一年) 選日通書一卷 同治十一年刊本(琉球)
一冊 上江洲家文書
- (11) (大清光緒五年歲次己卯) 選日通書 琉球版與世永家文書

有關琉球出版狀況的最早記述便見於曆書。琉球的曆書刊行早在 17 世紀就已出現,但現存曆書均為 19 世紀出版。《球陽》一書中有如下記述:

(尚貞王六年[1674])印造曆書通行國中。

成化乙酉(元年[1465]),金鏗奉使為通事入閩以慶賀進貢,併求錢。時學曆法而來,始造曆以行乎國中。然歷年已久未免舛誤。康熙乙巳(四年[1665]),楊春枝奉憲令,從司曆官金守約,已學曆法。至丁未年(1667),奉命赴閩,再學曆法,四載而歸。題請刻板曆書,未及成功,不幸而死。其弟楊春榮、從兄學曆未成,亦從金守約而學曆法,盡得其法焉。

後亦奉命爲司曆官。是年(1674),刻板已成,遂爲印造通行於國中。⁵

現存最古老的琉球曆,是國會圖書館收藏的《大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選日通書》寫本,此本係傳至江戶幕府的寫本。在久米島文書發現之前,⁶關於琉球曆的研究基本上都依據此寫本。該本封面上,有土佐藩校教授館(寶曆九年設置)的藏書印“教授館居”,故可推斷,其爲寶曆十二年(1762)漂流到土佐的琉球船上的琉球曆之抄寫本。⁷當時,土佐藩儒戶部良熙向漂流船上的琉球人詳細詢問並記錄了有關琉球的情況,寫成《大島筆記》一書。使用清朝曆書,象徵著朝貢國對天朝的尊奉;而琉球曆是琉球最古老的出版物,在當地有一定需求,需要批量複製並頒布給民衆。

在江戶時代,出版活動都以藩爲單位各自獨立進行,以藩校爲中心刊行“四書五經”等經書及其注釋書。不過,實際的情況更爲複雜。譬如薩摩藩,幾乎所有的藩版書物都在江戶刊行。幕府末期,薩摩藩與木村嘉平等江戶雕刻師關係密切,許多薩摩版都由他來雕刻。出版要成爲產業,必須要有一定規模的穩定需求。江戶時代的日本,只有三都(京都、大阪、江戶)的出版具備了產業性質。這三地集中了大量技術人才,也積累了豐富的技術和經驗。許多打著地方招牌的

5 參見琉球陽研究會:《沖繩文化史料集成5・琉陽・原文編》(東京:角川書店,1974/1982年),頁236,第469號。此外,關於琉球曆,尚有以下記述:頁233,第488號,“(尚貞王十年〔1678〕)印造曆書周行國中。康熙戊午(1678),蔡肇功(湖城親方)奉王命爲學曆法,隨正使耳目官向嗣孝(前川親方朝年)到福州,追隨薛一白盡學其法,至於壬戌年(1682)回國。蔡肇功爲司曆官,重修刻板,遂爲印造大清時憲曆,頒行國中。”頁270,第726號,“(尚敬王六年〔1718〕)本國曆書改名通書並用赤帙。自古琉球曆書皮用黃紙,名曰《時憲書》。紫金大夫程順則題請改曰《選日通書》。並外皮以紅紙。且改撰皮面文書以行國中。”頁335,第1179號,“(尚穆王四年〔1755〕)紅秉毅始學《時憲書》撰日之式。本國通書撰日與天朝憲書撰日有不相同者。紅秉毅(伊差川通事親雲上)爲副通事到閩,始學撰日新法,得其傳授而歸。自此將其新法印造撰日通書,而不用古法。”宋趙叔向《肯綮錄・撰與擇通》:“擇日爲撰日,《劉中山集》屢用之。”

6 在沖繩縣久米島發現的琉球王國時期的古文書,包括上江洲家文書、與世永家文書和山里家文書。

7 國立國會圖書館編:《人と藏書と藏書印——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本から》(東京:雄松堂出版,2009年),頁290。戶部良熙:《大島筆記》,載新村出監修:《海表叢書》(東京:成山堂書店,1985年),卷3,頁1—177。

出版物,其實大部分都是在三都出版的。通常是地方藩向三都的書肆發注,在三都製作雕版、印刷、製本,最上等的完成品獻給藩主,然後再根據需要印刷,雕版則送到各藩的藩校保管。在江戶時代這種形式相當普遍,所以並不適用今日的刊行分類,因為根本看不到發注方——即地方藩的影子。在考察琉球版時,同樣需要注意出版業的普遍外包化特徵,擺脫國民國家思維模式的束縛。

傳統目錄學在對圖書進行分類時,首先關注圖書的刊行地,刊行地為中國的就是唐本,日本為和本,朝鮮則是朝鮮版。但刊行地主義的角度顯然不適用琉球這一前近代地區。鑒於出版業外包發注的普遍做法,我們必須格外重視現實的出版物刊行狀況、用途及其背後的文化性社會性背景。因為,正如江戶的藩版幾乎都是向三都發注外包一樣,琉球人也採用了同一方式,即把書籍刊行委託給擁有技術和資本的出版中心。

因此,擺脫刊行地主義,從廣義琉球版的觀點出發把握琉球出版文化整體這一視角極為重要。在這一前提下,必須弄清圍繞出版物的諸種要素:何時(刊行年、印刷年)、何地(琉球、中國〔福州、北京、江南〕、日本〔京都、江戶、大阪〕)、誰(琉球人)、甚麼(書名)、為何(目的)、如何(刻工、印刷師、雕版、紙、墨)等問題,這些信息的積累是理解琉球出版文化的重要基礎。此外,還需要關注出版與琉球社會的關聯,包括刊本的需求(與寫本的競爭)、讀者問題(社會階層、識字人口、讀者人口)、刊行數、保存方式(雕版、書籍)等出版物的具體存在狀態;需要對古典目錄學進行反省,如忽視其他文化的中華中心主義的側面;既要尊重目錄學傳統(古典知識分子自我意識的產物,主要關注高級社會階層),又適當與之拉開距離。對琉球與中國王朝(明朝、清朝)、琉球與薩摩藩之間的特殊性雙重附屬關係,以及日本文化的隱蔽狀態也要特別留意。中國使節和江戶人看到了琉球想讓他們看到的東西(遮掩雙重附屬關係和偽裝獨立),也看到了自己想看的東西(琉球趣味)。高津認為有必要從現存書籍出發、把握琉球出版文化全貌,故編纂了《琉球漢籍調查目錄》。⁸

8 高津孝、榮野川敦編:《琉球列島宗教關係資料・漢籍調查目錄》(宜野灣:榕樹社發行:綠林堂書店發賣,1994年);高津孝、榮野川敦編:《增補琉球關係漢籍目錄》(鹿兒島:斯文堂株式會社,2005年)。

說到琉球版的研究史，在近代，有研究者通過殘存的出版物，對琉球的出版文化進行了考察，如時任第七高等學校教授的武藤長平著有《琉球訪書志》。⁹ 這篇論文是大正五年（1916）作者走訪沖繩進行出版物調查的結果。武藤在論文中列出了 14 種琉球版刊本：《中山詩文集》、《御教條》、《千字文》、《太上感應篇大意》、《童子撫談》、《小學監本》、《漏刻樓集》、《四書集注》、《四書俚諺鈔》、《琉球詩錄》、《琉球詩課》、《竹蔭詩稿》、《三字經》和《三字箴》。此外，還有有關雕版的信息，即《四書集注》和《四書俚諺鈔》的雕版置於尙侯爵邸，《童子撫談》的雕版則藏於浦添家。至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情況，《沖繩大百科事典》“琉球版本”部分（富島壯英執筆）的記載最為重要，裏面提到的現存琉球版有以下五種：

《童子撫談》1844 年（尚育十年，序文年）浦添朝憲（尚元魯）刊，田名宗經（梅帶華）刻字，豐平良權（馬執宏）序文，楷書體。

《太上感應篇大意》1858 年（尚泰十一年），喜舍場盛元（毛樹德）刊，運天常行書，田名宗經、宗相刻字，草書體。

《聖諭廣訓大意》約 19 世紀中葉，草書體。

《御教條》幕府末年——明治初年，仲本朝睦刊，楷書、草書並記。

《六諭衍義大意》幕府末年——明治初年，仲本朝睦刊，豐川正英編著，仲本朝重書，楷書、草書並記。

三、琉球士族的文化教養

說到琉球的漢詩集，首先要關注程順則的出版活動。

程順則（1663—1734），是近世琉球的代表性政治家和文化人，在福建出版

9 武藤長平：《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6 年），頁 185—203 收錄。原載《歷史地理》，大正六年（1917）十二月一日稿。

過三種書籍。若按刊行地主義來說,都屬於中國福州刊本。三種書籍,一是清·范鉉撰《六諭衍義》二冊,康熙四十七年(1708)刊本,附清·竺天植序。現沖繩縣立圖書館東恩納文庫藏有一套二冊;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藏有第一冊。據東恩納寬惇《六諭衍義傳》說,“說到《六諭衍義》,乃程氏初次渡閩,拜訪其師事竺天植先生,翻閱其桌上的《六諭衍義》,懇請見贈,攜回日本。第四次入閩時,投入六十金出版《六諭衍義》及自著《指南廣義》”,“其目的除教習風化以外,亦欲教授正音”。“《程氏家譜》記曰:順則在閩,損資六十金板行《六諭衍義》一部、《指南廣義》一部,藏板館驛。但此雕板後為名護家家藏,今當或藏沖繩縣立圖書館或在久米村鄉學明倫堂”。程順則為出資者和委托出版人,刊行地為中國福州,刊行後的雕板則帶回琉球保存。同樣,琉球·程順則撰《指南廣義》一卷附一卷、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自序刊本也由程順則委托並提供資金在福州刊行,現藏於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¹⁰

在近世琉球,存在三個隸屬於不同社會階層的區域土族文化,即,首里、那霸和久米村這三個地域的土族文化。首里,是琉球王國的首都,琉球的政治和文化中心。這裏有屬於王族和貴族的按司階層及供職王府的中下層官吏階層。雖然二者階層有異,但從文化角度可統稱為首里土族。那霸則是聯繫中國和日本的貿易港口,居住著許多從事交易工作的政府工作人員,也曾有過從日本本土薩摩藩派駐琉球的地方政府人士。那霸的地域性特點,決定它需要那些精通日本文化的人。而久米村指的是現那霸市久米村一帶。這個地方是15世紀前後來自中國福建的“渡來人”的居住地,他們稱此地為“唐營”。這些“渡來人”發揮他們在出身和技能上的長處,成為從事對華貿易的職業集團,在琉

10 此外,琉球程順則所編收錄琉球人詩文的《中山詩文集》、清雍正三年(1725)清任五倫序刊本也似在福州出版。上里賢一編:《中山詩文集》(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98年)影印收錄了內閣文庫藏本。又,清王登瀛《中山詩文集序》(康熙六十年,1721)稱琉球頗有得到清朝文教之感化的優秀詩文,“時吾門從游諸子告予曰:‘匯梓成集,可乎?’予曰:‘善哉。’亟授梨棗,俾人知中山國王及王戚內外諸臣文獻駸駸”。《中山詩文集》後由程順則的六世孫程德裕在福州重刊。咸豐六年(1856)琉球程德裕序曰:“幸於丙辰歲,予奉王命,充頭號貢船大通事官。前詣閩省,爰不惜工費,付梓以成其鏤。”島根縣立圖書館等收藏。

球社會中占有重要地位。

下面，我們通過兩種資料，來考察琉球的書物接受、教養以及那霸士族久米村士族的教養等幾個問題。這兩種資料分別是琉球王國內部資料《阿嘉直識遺言書》和江戶日本資料《大島筆記》。《阿嘉直識遺言書》對考察 18 世紀琉球知識人之教養具有重要意義，沖繩學的前輩研究者東恩納寬惇曾經特別關注並介紹過這一資料。¹¹ 據東恩納寬惇介紹，《阿嘉直識遺言書》一書原題《阿嘉親雲上直識愚息松兼直秀へ相教へ候遺言の條々》，二戰前原本收藏於沖繩縣立圖書館鄉土室，後焚毀於二戰戰火。現有若干種鉛排文本存在，《東恩納寬惇全集》卷 5 也有收錄。《阿嘉直識遺言書》記錄了 18 世紀後半那霸的這位知識分子寫給兒子的遺言書，書中懇切講述了對那霸士族來說何為安身立命所必須的教養，遺書的許多內容具有獨特而重要的價值，是我們瞭解當時琉球社會的極好材料。

阿嘉直識姓錢，生於尙敬王八年（1712），卒於尙穆王三十三年（1784）。《遺言書》（前半部分 25 條）係他 58 歲時寫給六歲的兒子松金直秀的，此時他的職位是阿嘉親雲上。5 年後的尙穆王三十二年（1783），即逝世前一年，又追加了後段 4 條遺言。這時他的職位已是大田親雲上。阿嘉直識雖為那霸士族，但進入近世以後，那霸士族的社會地位有所下降。據《沖繩縣的地名》一書“那霸”條所述，¹²“古琉球時期，在那霸里，包括主職在內，許多官職門戶都呈開放狀態。但至近世，首里出身者占據官職愈烈，那霸的高官僅有役知八十石御物城職。脅地頭家也同樣，琉球一件帳這一級別上，只有 24 家；首里人口規模雖不過是那霸的四倍，卻有 246 家（除去王子、按司家，自惣地頭家到脅地頭家）；久米村人口只有那霸的一半，卻也有 43 家之多。與之相比，那霸少之又少。”那霸的富裕階層多半“擔任需要很多個人負擔的在番奉行接待性職位——問役、御假屋守和大和橫目等。即便如此，能够晉升到脅地頭的也只有很少一部分，大

11 參見東恩納寬惇著；琉球新報社編：《東恩納寬惇全集》（東京都：第一書房，1978—1982 年），卷 5，頁 409—421。

12 平凡社地方資料センター編集：《沖繩縣の地名》（東京都：平凡社，2002 年），頁 134—137。

部分人在此以前便已經耗盡家產”。可見，那霸士族面臨的士族間競爭極其嚴峻。因此，阿嘉直識視自己為“中興”之祖。他說自己不僅擔任了役知八十石的御物城職，脅地頭一職也從作得（來自土地的收入）壹石餘的阿嘉親雲上，成為作得拾五石餘的大田親雲上。也許是有上天佑護，但阿嘉直識通過自身艱辛努力獲得的文化資本具有極大意義。為此，他寫下遺言書，教誨兒子要掌握文化資本。阿嘉直識 15 歲亡父，家族一門中沒有人給予他指導，令他痛感掌握文化資本的重要性，這應該是他寫下這部《遺言書》的重要動機。

那麼，為了贏得那霸士族間的激烈競爭，究竟需要哪些教養？阿嘉直識對此又有哪些想法呢？作為文化資本的學問教養，大致可以分為漢學與和學這兩部分。遺言書前段第 5 條講到，學問分為漢學與和學，跟隨好老師學習十分重要。要獲得文化資本，第一是家庭教育，家學將成為一個重要的出發點。阿嘉直識父母早亡，為習得作為文化資本的教養歷盡艱辛，寫作遺言書時他已 58 歲，面對 6 歲的兒子，他很擔心教育時日不足。為此，他特別強調要跟隨好老師學習。實際上，漢學與和學不過是需要習得的“藝能”的一部分，阿嘉直識將整個藝能分為三個階段。按《遺言書》前段第 9 條，作為士族應該習得的有：（一）漢學、和學、書札的法式、文書書付類。（二）古實方、仕付方、謠的訓練。（三）插花、茶道、示現流。那霸士族參與和薩摩的貿易交易，需要為薩摩派遣的在番奉行承擔接待工作，必須具有日本武士階層所必備的教養。那麼，我們就來看看有關漢學的各項藝能的情況。《遺言書》前段第 6 條記述了漢學和和學的具體內容：在 15 歲到 25 歲間學習中國典籍，以《六論》、《小學》、“四書”為中心，兼及《古文》、《詩經》。居首的《六論》即《六論衍義》，係清代范鉉用白話注解的明《太祖六論》（六條旨意論）。

如前所述，《六論衍義》有琉球程順則刊琉球版存在。《六論衍義》進入琉球社會，由此而始。程順則提供資金支持在福建出版該書。程順則本《六論衍義》即康熙四十七年（1708）福建刊本，附有清竺天植序。序云：“琉球程順則於康熙二十三年甲子（1684）春，造訪福州竺天植（揚州人，71 歲），偶見其桌有范鉉《六論衍義》，遂覺此書適於教化人眾，也適於教授琉球年輕者習得中國語，便於二十五年依舊本原樣出版。”程順則既是出版發注人，又是出資人。在中

國福州刊行後，他又將雕版拿回琉球。對久米村出身的程順則來說，《六諭衍義》也是很好的漢語教科書。享保四年（1719），曾統治過琉球的薩摩藩藩主島津吉貴，向德川幕府進獻《六諭衍義》（康熙四十七年刊本），後幕府命荻生徂徠訓點《六諭衍義》（享保六年，1721）、室鳩巢日譯《六諭衍義大意》於享保七年（1722）刊行，在江戶時代通過琉球傳播和普及於日本。

“小學”是指南宋朱熹撰《小學》六篇，係朱熹友人劉子澄受朱熹之托而編集。江戶時代在日本刊行最多的，是明陳選所注《小學句讀》。現八重山博物館所藏琉球王國時代的《小學》，均為《小學句讀》和刻本或寫本。《小學句讀》的各種版本中有琉球版存在。但有一部分琉球版刊本的出版過程和刊行地很難判斷。從刊本整體樣式來看，雕版本身應該是出自中國，但由於缺少封面、刊記、序文等有關出版信息，造成許多不明之處的存在。存世的琉球版《小學句讀》均為殘闕文本，估計係以享保六年的和刻本為底本復刻，復刻時省略了訓點。

接下來是“四書”，即南宋朱熹《四書集注》。在琉球，人們一般使用文之訓點的特定訓讀文本，即文之點《四書集注》。具體說，是由桂庵玄樹（1427—1508）第三代弟子文之玄昌（1555—1620）對其先師桂庵玄樹點本進行整理簡化加工，再由文之玄昌的門人泊如竹（1570—1655）加撰跋文後刊行出版。¹³ 作為日本最早的訓點本《四書集注》，此本頗有名氣；而在琉球，文之點《四書集注》尤其受到人們的推崇。關於文之點《四書集注》的底本，正如川瀨一馬所說，“其訓點本的底本乃明版（書林克勤齋余明台梓行）之木記”，¹⁴即明末福建書肆余明台刊本。至於文之點與琉球的關係問題，《三國名勝圖會》一書的記載最為重要，該書卷 50 如竹翁傳這樣寫到：“曾讀琉球經書，皆用漢音，不知和讀，翁授之文之點‘四書’，是以琉球始知和讀，及至今國中十分之八皆用文之

13 川瀨一馬：《近世初期に於ける經書の訓點に就いて——桂庵點・文之點・道春點をめぐる——》，載川瀨一馬：《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東京都：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3年），頁 1444—1469。

14 見注 2。余明台，又名碧泉，號克勤齋，乃南宋至明末間據福建出版界核心地位的建安余氏一族，但現存族譜不見其名。

點四書。”¹⁵ 接著,又在夾注中記曰:

天保十三年壬寅,遣中山王尚育賀慶使往江都,於大阪購琉球人文之點《四書歸》,達數十百部。因當時文之點板行“四書”較小,若購盡則可重新製版供售,此俱由琉球尊崇文之點之故。可見翁欲將文之點推廣於琉球,如其和漢音讀法,久米村學校唐音和讀兼習,此外首里都及全國均用和讀訓點本。

泊如竹,¹⁶屋久島安房村生,姓泊名日章,自號如竹散人。少時入久遠山本佛寺為僧,後於京都本能寺習法華宗。後回到薩摩,於大龍寺文之玄昌門下學習朱子學八年。元和十年(1624),刊行《桂庵和尚家法倭點》、傳授桂庵玄樹的訓讀法,寬永三年(1626),於江戶草文之點《四書集注》跋文,四年(1627)撰文之點《周易傳義》跋文,各自刊行。

關於泊如竹居住琉球,伊知地季安《漢學紀源》卷4記載如下:

寬永九年年六十矣。聞明人秀才來於中山,浮海適琉球國。乃師秀才講究“四書”詩書、理學精熟。國王師事之。先是,夷俗未知禮儀。及如竹至教以人倫。……居之三年,如竹不樂遠就異國,乃去歸本島。

如竹自寬永九年(1632)起三年間居住琉球,攜寬永三年或八年刊行文之點《四書集注》當屬實。彼時,中山王尚育師事如竹,決定了文之點在琉球的地位。《大島筆記》卷下有:“點本用薩摩僧文之所點。”¹⁷ 結合《三國名勝圖會》記事考究,可知琉球一貫使用文之點本。

15 鹿兒島藩:《三國名勝圖會》(東京:西鄉活版印刷所,1905年),卷50;如竹翁傳(鹿兒島:青潮社,1982年),第四卷,頁275—286。

16 有關泊如竹的事項可參照伊知地季安:《漢學紀源》,載《鹿兒島縣史料・舊記雜錄拾遺・伊地知季安著作史料集九》(鹿兒島:鹿兒島縣,2011年),卷4,頁67—99。

17 戶部良熙:《大島筆記》,載新村出監修:《海表叢書》,卷下,雜話上。

大正五年，武藤長平探訪沖繩調查書物，其《琉球訪書志》有曰：“琉球板《四書集注》及《四書俚諺鈔》的板木在尙侯爵邸，《童子摭談》板木在浦添家，而其等書籍於琉球無存，實為憾事。”¹⁸這些琉球版本現皆已散失，故這一證言成為琉球版研究的重要資料。琉球版（推定）《四書集注》中，除《中庸章句》之外，《大學章句》、《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均現存於世。

《遺言書》接著舉出《古文》、《詩經》。一般來說，“古文”指唐宋時形成的散文文體。在這裏，應指《古文真寶》一書。《古文真寶》輯錄中國詩文，由元代黃堅編集，分前後二集，前集收錄漢至宋的詩歌，後集則以古文為主。作為輯錄著名詩文作品供初學者使用的教科書，《古文真寶》在江戶時代廣為流傳。而在中國，卻被視為俗書以致散佚。在儒教古典當中，此書和最古老的詩集《詩經》分別成為詩歌、散文學習的基本教材。

《遺言書》前段第六條後半講到和學。¹⁹ 和學即歌詠和歌的學問，阿嘉直識承繼了二條家的學問。他列舉的必讀書《三部抄》輯錄了藤原定家的歌論《詠歌大概》、秀歌選集《秀歌之體大略》、《百人一首》，以及非秀歌類的和歌集《未來記・雨中吟》，屬於歌學的基本書籍。此書將敕撰集三代集、御子左家的三代集以及藤原為家私家集《為家集》、頓阿的私家集《草庵集》、三條西實隆的私家集《聽玉集》，指定為必讀文獻。另外還推薦了一些歌學書籍，有藤原定家《和歌庭訓》、《每月抄》、有賀長伯《初學和歌式》（元祿九年刊）、《和歌八重垣》（元祿十三年刊）等，還有頓阿、二條良基《愚問賢注》、頓阿《井蛙抄》等作品。此外《伊勢物語》、《源氏物語》、隨筆《徒然草》也是培植和歌教養的重要書籍。

《遺言書》前段第七條涉及書法學習。²⁰ 琉球的書法屬於御家流，近世琉球的行政文書也基本以御家流書寫。而江戶日本則以和式書法流派“青蓮院流”為主流。尊朝親王（1552—1597）是青蓮院流的書法大家。《遺言書》例舉的範

18 國立國會圖書館編：《人と藏書と藏書印—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本から》，頁290。戸部良熙：《大島筆記》，載新村出監修：《海表叢書》，卷3，頁1—177。

19 見《阿嘉直識遺言書》。

20 見《阿嘉直識遺言書》：“習字範書宜採《尊朝親王御染筆》、《云洲往來》、《平家灌頂卷》以及其他範本，務仿書精練，習其精彩。”

本《雲州往來》，是出自平安時代藤原明衡之手的書簡集，收錄有二百餘封書簡，也稱《明衡往來》。這些被稱為往來物的書簡例文集成為習字的初等教科書。

以上，我們依據琉球王國的內部資料《阿嘉直識遺言書》，考察了 18 世紀後半那霸士族的主要學問，以及支撐這些學問的典籍。下面，我們再通過 18 世紀後半江戶日本保存的資料，看看琉球王國久米村的學問。

乾隆二十七年(1762, 寶曆十二年)，前往薩摩的琉球船遇難漂流到土佐，土佐藩儒戶部良熙對這些琉球人進行了詢問採訪。據詢問筆錄《大島筆記》卷下記載，一個叫做照屋里之子的人說，琉球的學校學習《小學》、“四書”和“六經”，過去使用一本叫備旨的書物，近年則有名曰《四書體注》的書物傳入，目前正在使用這本書。學校叫明倫堂，王子以下任何人都可以修學，“四書”用薩摩文之和尙訓點本。²¹

這艘琉球船的船長，是潮平親雲上，姓翁，名士璉，自稱盛成首里赤平人。²²首里於 1798 年設立了國學，文中的“學校”應該是指久米村的明倫堂；“照屋里之子”大約也是久米村出身的人。久米村也叫唐營(唐榮)，是設置在那霸港附近的中國人居留地，這些中國人以此為據點，從事與中國以及琉球的交易活動，後來更在此定居。在與明朝的朝貢關係中，作為一個從事海外貿易的職能集團，這些人成為王府行政機構的一部分。到了近世，遵從薩摩藩的意向，這個集團得到擴充，士族人口不斷增加。1718 年，在程順則的建議下，久米村設立了明倫堂(學校)。明倫堂培養了許多高水準人才，這些人承擔了有關朝貢的各種業務和外交事務。他們不像那霸士族那樣，具有與江戶時代日本武士相同的教養。久米村士族的教養是向中國士大夫看齊的。他們的出發點是文之點《四書集注》那類使用訓讀的儒教古典教育，當需要進一步學習理解“四書”、“五經”時，先用中國出版的《四書備旨》，²³後來則使用《四書體注》。《四書體

21 鹿兒島藩：《三國名勝圖會》，卷 50；如竹翁傳，第四卷，頁 275—286。

22 同上。

23 真境名安興：《沖繩教育史要》，載真境名安興著；富島壯英等編集：《沖繩教育史要》(那霸：琉球新報社，1993 年)，卷 2，第 3 篇第 3 章注，頁 410，有：“經平等學校公事賬確認此為《四書備旨》四冊。”

注》是根據南宋朱熹《四書集注》，將其注釋進一步細化的科舉考試參考書。康熙三十一年(1692)，清范翔在《四書集注》的基礎上編纂出版了《四書體注》，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前後傳入琉球，成為久米村明倫堂的教科書。

1798年，即18世紀的末期，首里設立了琉球的最高學府——國學。在這裏，以講談學生為對象的考試，會從《四書體注》、《五經體注》、《二十一史》中出題；面向官話詩文學生，則從《尊駕》、《百姓》、《人中畫》、《四書體注》裏出題。²⁴ 講談學生是那些學習行政文書的學生，而官話詩文學生則學習中國語和中國詩文。《五經體注》與《四書體注》形式相同，也是詳注“五經”，用於科舉考試的參考書；《尊駕》、《百姓》則是在琉球使用，被稱為琉球官話的中國語教科書；《人中畫》是根據明末清初口語小說改寫的官話教科書。²⁵

在設立國學的同一年，琉球的中等教育學校——平等學校誕生，但所用教科書不詳。直到1835年，琉球的初等教育學校——村學校所纔得以建立。村學校所學習的是《三字經》、《二十四孝》、《小學集注》、“四書”。²⁶《三字經》一卷對孩子進行道德教育，《二十四孝》則用五言絕句形式介紹中國古代至宋代的二十四位孝道人物。作為初等教育教科書，這兩種書在江戶日本也被廣泛使用。

18世紀，在學校制度確立以前，琉球的初等和中等教育都由家庭承擔。在漢學方面，開始是學習《三字經》、《二十四孝》，接著學習《六論》、《小學》和《四書》。這些江戶日本出版的和刻本及其派生的寫本，是通過訓讀的方法學習

24 同上，第3編近世期，頁396，云：“講談學生需要對（一）《四書體注》（凡一頁半）、‘五經’中《詩經衍義》、《書經體注》、《易經會解》、《禮記陳浩記》、《春秋胡傳》等（凡一頁半）以及二十一史中（凡一頁）標施訓點。（二）以老師要求，起草論文、呈文、咨文、錄文之一種的文稿（約三頁）。官話詩文學生則須（一）以官音（四聲句讀）自《尊駕》、《百姓》（書名）及《人中話〔畫〕》（書名）中朗讀（約一頁）。（二）為《四書體注》（凡一頁）標施訓點。（三）作詩。”另，《沖繩教育史要》中可見《唐詩合解》、《小學》、《近思錄》等書名。

25 所謂“琉球官話”乃會話集，藏於天理大學附屬天理圖書館、法政大學附屬沖繩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那霸市歷史博物館等。分為語彙集《官話》、《官話三字口》、簡單會話集《尊駕》、《學官話》、《官話問答便語》、語彙集與會話集合一的《廣應官話》、長篇會話集《百姓》以及共外交場合使用的問答集《條款官話》等。參照木津祐子編：《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藏琉球寫本“人中畫”四卷付“百姓”》（京都：臨川書店，2013年）。

26 據真境名安興：《沖繩教育史要》，第3編近世期，頁390—410。

的。久米村的明倫堂和首里的國學進一步採用《四書體注》、《五經體注》、《二十一史》、《近思錄》、《唐詩合解》作教科書。《四書體注》和《五經體注》沒有和刻本,所用俱是中國刊本。在久米村士族的藏書——楚南家文書(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中,有嘉慶二十年(1815)刊《四書體注》(集古堂藏板),教科書上標有圈點和詳細標注,但無讀音順序標點和送假名,是一種以中國語直讀形式學習的方法。

關於首里士族的教養,目前還缺少明確有力的資料,現在可見的一則資料,是1803年首里士族楊文鳳在回答薩摩石塚崔高的提問時所說的一段話。²⁷

石(石塚崔高)曰:“貴國創建學校三年於茲,其設學本意何如?”

(楊文鳳)曰:“琉球蕞爾小邦,創建學校,一則慕效上國高風,教國子弟,欲成人材,以厚風俗也。設學本意不過如是,畢竟欲明人倫而已矣。”

石曰:“學校教子弟讀書,用華音讀否。”

楊曰:“讀法依日本用鈎挑迴環,顛倒讀之,實字先讀,虛字後讀。但久米村亦有學校,多歷年所子弟皆學中國言語,讀書亦用華音,然日本讀法不廢也。國王命令及民家通用書柬等式,與日本不異。惟通中國書柬表文,一依中國書法。”

石曰:“首里學校何名?”

曰:“堂上扁曰‘崇儒重道’,國相尚周所書也。……文鳳作學校記,掛在正堂壁上。”

久米村學校明倫堂,設立於享保三年(1718)。而所謂“首里學校”是指首里的國學(寬政十年〔1798〕設置)。久米村的教育方針是中國語和日本語並存,而其他地區一般都採用日本式訓讀法。首里士族的教養不似那霸士族那樣日本化,但也不像久米村那樣中國化。

²⁷ 《琉館筆譚》石塚崔高編,乃與來自琉球訪問薩摩琉球館的楊文鳳進行筆談之記錄。據岩本真理:《“琉館筆譚”翻字、注釋》,《人文研究》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紀要,卷64,2013年3月,頁179—196。

四、琉球漢詩集

琉球人的漢詩文集共有二十多種，²⁸排除有歧義的刊本之後，這些詩文集的情況大致如下：詩文作者計有 15 人，包括 11 位久米士族和 4 名首里士族。在久米士族中，蔡文溥、阮宣詔、鄭學楷、林世功、林世忠等五人為官生出身；首里士族方面，向克秀、東國興二人也是官生出身。官生制度始於 14 世紀而持續至 19 世紀，是一個琉球王國向中國派遣留學生，及其他有關人員到國子監、太學修學的制度。久米村所從事的與中國王朝的貿易，自尙真王（1477—1526 在位）一代開始，便由久米村人壟斷，並逐漸特權化。1797 年進行制度改革，半數以上的職位從首里士族中選拔，久米村的既得權益逐漸被剝奪，官生發生騷動，掀起激烈的反對運動。所謂漢詩文能力，體現在撰寫有關對華貿易的外交文書，以及與外交儀禮有關的詩文創作方面，是久米村士族必須具備的教養。但對首里士族來說，這些卻是第二位的東西。由於官生有一部分來自首里士族，使得首里的教育發生變化。而另一方面，首里那裏也具備發生變化的基礎。

在首里士族的漢學領域中，具有象徵性的人物並不是官生，而是首里士族中首次刊行漢詩集的楊文鳳。楊文鳳《四知堂詩稿》附有日本奧田元繼（尙齋）序（文化三年六月〔1806〕）、琉球楊文鳳自序（享和四年冬至〔1804〕）、中國趙文楷序、中國李鼎元序、中國吉壽序（嘉慶七年十一月〔1802〕）和中國姚文蔚序（嘉慶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02〕）。據自序記述，他的作品有數百首之多；嘉慶五年（1800）五一十月，冊封正使趙文楷、副使李鼎元訪問琉球時，楊文鳳曾與他們有過詩歌贈答；嘉慶七年（1802）七月，楊文鳳奉王命前往福州，途中遭遇颱風，所乘船只於十一月漂流到臺灣，數月後抵福州，期間與不少地方官員有過詩作贈答；嘉慶九年（1804）夏天歸國後，用七八天時間前往薩摩；薩摩儒學者向楊文鳳乞要詩集，遂將手頭僅有的幾部贈予對方。《四知堂詩稿》三卷收

28 參見高津孝、陳捷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全 36 冊。

錄乾隆五十三年(1788)正月至嘉慶五年(1800)十月間的詩作。與久米士族在中國福建刊行詩集不同,首里士族楊文鳳《四知堂詩稿》刊行於日本大阪,值得關注。久米村士族經常遣人往福建福州的琉球館,與中國的關係極為密切,這一點與首里士族頗有不同。《四知堂詩稿》的校正有薩摩的石塚崔高擔當。前述石塚崔高《琉館筆譚》,即兩人在薩摩琉球館筆談的記錄,從中可見兩人關係之親密。詩集的刊行也是通過薩摩的人脈得以實現。刊記曰:“文化三丙寅年刻 薩州書房 兒玉利兵衛 大阪書房 泉本八兵衛 樫本勘兵衛。”可見薩摩和大阪書肆的名字。

在琉球漢詩文出版方面,程順則是一個最為重要的人物。程順則(1663—1734)是琉球的政治家、學者,係久米村程氏七世,字寵文,號念庵,人稱名護親方。官至紫金大夫。1683年,前往中國,從福州陳元輔學習,1687年歸國。1689年以在留通事往福州,1691年歸國。歸國時購入《十七史》,納於那霸的孔子廟。1706年以進貢正議大夫往北京,歸國時在福州出版《六諭衍義》、《指南廣義》並攜回琉球。有詩集《雪堂燕遊草》,亦可見於《中山詩文集》。《雪堂燕遊草》今已無存,但確信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在福建刊行。²⁹ 此書若保存下來,將是琉球漢詩文集中刊行最早者。據正德四年(1714)京都刊行的《雪堂燕游草》原本刊行者——書肆的瀨尾維賢(用拙齋,1691—1728)之跋文記載,彼持有《雪堂燕游草》康熙刊本。《中山詩文集》係琉球程順則編纂、收集琉球人詩文的總集。版本有兩個系統。最早的版本,是鄭晃和王登瀛於康熙六十年(1721)分別作序的福州刊本,復旦大學圖書館及沖繩縣立博物館有藏。1998年影印出版的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本,除鄭晃和王登瀛序外,另有雍正三年(1725)任五倫序,以及同年任上哲跋,這些應該都是後來所加。據王登瀛序所敘,王登瀛曾在福州柔遠驛(琉球館)接受儒教經典教育,並與琉球人蔡鐸、曾益、程順則交游,表示了對後來出版的中山詩文所收作品的贊賞,此時有琉球門人提議刊行詩集,並給予贊助。此外,沖繩縣立圖書館和島根縣立圖書

29 上里賢一:《雪堂燕游草》,載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繩大百科事典》(那霸:沖繩タイムス社,1983年),中,頁572。

館藏有另一種在上述三序一跋之外再附咸豐六年(1856)琉球程德裕“中山詩文集重鐫序”的福州刊本。程德裕是程順則的六世孫,此版本係他個人出資刊行。康熙、雍正刊本目次有 22 個項目,卷頭《奉送翰林汪先生還朝序》到《林副使德政歌》的詩文,是康熙二十二年(1683)訪問琉球的冊封使汪楫(正使)、林麟焄(副使)與中山王尙貞、中山王世子尙純、攝政王弟尙弘毅等進行交流過程中創作的詩文。接著是《執圭堂詩草》(琉球曾益)、《觀光堂游草》(琉球蔡鐸)等較程順則年長之琉球人的詩集。《雪堂紀榮詩》至《關帝廟記》,則是與程順則有關的詩文以及程順則自身創作的詩文。再接下來,是清陳元輔的琉球畫家傳記《中山自了傳》、程順則早逝的兒子程搏萬的詩集《焚餘稿》,以及較程順則年若的琉球周新命的詩集《翠雲樓詩箋》。整體上看,收錄詩文多與琉球有關。另,康熙、雍正刊本中無目錄中《重修臨海橋碑文》、《焚餘稿》,而重鐫本則有補錄。

《四本堂詩文集》係琉球蔡文溥(1671—1745)詩文集。此人做過久米村的官生,這是其第一本詩文集。全書有《四本堂文集》、《四本堂詩集》、《御製耕織圖詩》三部分組成。《御製耕織圖詩》缺第一葉、第二葉。有清葉紹芳序(雍正十年[1732])、清劉敬與序(乾隆二十年[1755])、王登瀛序(雍正三年[1725])、清徐葆光題(康熙五十八年[1719])、清謝道承題(雍正二年[1724])。據劉序可知,雍正年間詩文集出版後,作過修正,增補晚年作品後再度刊行。蔡大鼎,1823年(道光三年、尙灝二十年)生,字汝霖,久米村人。後承繼其父,成為伊計親雲上(屬於與那城間切的伊計村的脅地頭)。五次前往中國,推定最後客死北京,卒年不詳,但應在 1884 年(光緒十年、明治十七年)之後。他是一位歷經琉球王國末期至琉球處分(1872 年琉球藩、1879 年沖繩縣)這一動蕩時代的文化人。作為琉球漢詩人,蔡大鼎在琉球王國時代漢詩人中作品最多。有關他的詩集,沖繩縣立圖書館(舊東恩納寬惇文庫)藏有以下四種:《閩山游草》一卷附《續閩山游草》一卷,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北燕游草》一卷,同治十二年(1873)刊本;《北上雜記》六卷,光緒十年(1884)刊本,僅存卷 1。第二,這些作品均以客居中國間的詩歌、文章為主。另外,最近又發現以下五種詩文集,匯集了琉球的詩歌和文章:《漏刻樓集》一卷附《伊計村游草》一卷,咸豐十一年

(1861)序刊本(慶應義塾圖書館藏),自序作於道光二十八年(1848);《欽思堂詩文集》三卷,咸豐十一年(1861)序刊本(慶應義塾圖書館藏),自序作於咸豐元年(1851);《續欽思堂集》一卷附《聖覽詩文稿》一卷,光緒三年(1877)刊本(早稻田大學圖書館所藏);《續欽思堂集》,自序作於同治五年(1866);《聖覽詩文稿》,自序爲同治四年(1865)。

另,琉球蔡肇功(1656—1737)《寒窗紀事》一卷(同治十二年[1873]刊)意在彰顯先祖,由蔡大鼎刊行。至於《東游草》、《琉球詩課》、《琉球詩錄》請參見前述。

官生即琉球派往中國的留學生,清朝時,這些留學生在北京的國子監學習。留學期間他們在北京國子監創作的詩作被編成詩集在北京出版。³⁰ 道光二十四年(1844)附有孫衣言序的四卷本選集《琉球詩課》,輯錄了四位來自琉球的北京國子監官生阮宣詔、鄭學楷、向克秀、東國興的試帖詩。關於孫衣言添削修改琉球人詩作一事,有具體資料保存至今。琉球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東國興詩集》卷頭右上方有“瑞安孫依言評定”等紅筆標記,對詩集中東國興每一首詩都有詳細批點。³¹ 據《琉球詩課》小序,阮宣詔,字勤院,琉球國久米府人;鄭學楷,字以宏,琉球國久米府人;向克秀,字朝儀,琉球國首里人;東國興,字子祥,號愚山,琉球國首里人。四人均官拜“里之子”(約等於中國的正五品),並同爲國子監肄業官生。同一年,即道光二十四年(1844),又有孫衣言作序的四卷本《琉球詩錄》刊行,收錄了四人的古今體詩。上述兩書刊行 29 年後,有書名相同的二卷本《琉球詩課》和《琉球詩錄》刊行。二卷本《琉球詩課》收錄北京國子監官生、琉球人林世功和林世忠的試帖詩;二卷本《琉球詩錄》選集了兩

30 高津孝:《琉球詩課と試帖詩》,《鹿大史學》,1995 年第 43 號,頁 1—14。四卷本《琉球詩課》現存那霸市所藏尙家文書、沖繩縣立圖書館所藏東恩納文庫、法政大學所藏楚南家文書;四卷本《琉球詩錄》現存法政大學所藏楚南家文書、赤木文庫、大阪大學附屬圖書館所藏懷德堂文庫;二卷本《琉球詩課》現存那霸市所藏尙家文書、沖繩縣立圖書館東恩納文庫、島根縣立圖書館;二卷本《琉球詩錄》藏那霸市所藏尙家文書、沖繩縣立圖書館東恩納文庫、法政大學所藏楚南家文書、島根縣立圖書館及沖繩縣立博物館。

31 參照高津孝譯;陳正宏著:《琉球訪書記》,載《東アジア海域交流史 現地調査研究——地域・環境・心性——》,2009 年 1 月,第 3 號,頁 220—227。

人的古今體詩。依《琉球詩課》小序的介紹，林世功，字子敘，琉球國久米府人；林世忠，字子翼，琉球國久米府人。兩人俱為國子監肄業官生。二卷本《琉球詩錄》附同治十二年（1873）孫衣言序，曰“予嘗擇其（琉球人的詩）雅者錄而刻之，謂之《琉球詩錄》。今春琉球學生林世功在監期滿。其師教習徐君干亦刻詩錄”。二卷本《琉球詩課》附同治十二年（1873）孫衣言序，言：“教習徐君已選琉球弟子詩刻為《詩錄》。又所做帖體詩別為一編刻之。大抵仿予前之所刻。”可見，四卷本《琉球詩課》、《琉球詩錄》為國子監教習孫衣言編集刊行，而二卷本《琉球詩課》、《琉球詩錄》則由國子監教習徐干（字小勿，邵武人）仿孫衣言的四卷本《琉球詩課》、《琉球詩錄》編集刊行。不過，如二卷本《琉球詩錄》孫衣言序所敘，“琉球人極重予之前錄，幾近家家備之”。就是說，上述詩集的閱讀和使用對象是琉球社會，而現在的中國幾乎沒有此類文本留存。人們把這種由其他地區的人刊行的琉球人著作稱為琉球版周邊刊行物。類似的例子在江戶時代的日本也曾有過。³²

五、結 論

琉球的三個士族集團——首里士族、那霸士族和久米村士族，在文化和教養上各有不同。那霸士族以訓讀方法學習中國漢學，同時習得日本武士階層的和學（和歌、御家流書道）。而久米村士族原本是中國裔居民的子孫，擔負著琉球王國的貿易和外交，他們不僅通過訓讀學習漢學，還進一步學習中國語，通過中國語學習中國文化，培養高深的儒教素養。至於首里士族，則沒有那霸士族和久米村士族那樣明顯的特徵。

³² 琉球程順則《雪堂燕游草》，正德四年（1714）於京都刊行。又，文化三年（1806），琉球楊文鳳《四知堂詩稿》三卷由薩摩藩士石冢崔高校正刊行。刊記“文化三丙寅年刻 薩州書房 兒玉利兵衛 大阪書房 泉本八兵衛 檜本勘兵衛”（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刊記中有“薩州書房兒玉利兵衛”，可推定出版於大阪。《東游草》三卷，天保十四年（1844）在江戶刊行。《書志》記曰：“《東游草》三卷，（上卷）琉球鄭元偉撰，（中卷）琉球魏學賢撰，（下卷）琉球尚元魯撰，日本薩摩鯨島玄霧、黑田恒校。江戶尋雲堂。”（國立公文書館內閣文庫所藏）。

琉球漢詩文文化的中心當然非久米村莫屬。作為一個依靠中轉貿易、朝貢貿易而存在的島嶼國家,琉球需要並形成了一個精通琉球——中國貿易、外交交涉、外交儀禮的專家集團。這個人才集團留下了衆多漢詩文作品,其中包括許多抒寫往來琉球、福州、北京的紀行詩。這些作品的一部分本身具有文學藝術價值,值得讀者閱讀品鑒;而更重要的是,這些漢詩文乃是中國和琉球的歷史文化交流以及東亞海域文化交流的一環,它們展示了東亞文化交涉的細部結構。

包括琉球漢詩集在內的琉球版已經無法以刊行出版地的概念進行規約。琉球人的書物大多採用外包發注形式出版,琉球通常通過中國以及日本的文化出版中心刊行琉球的書物。不僅如此,琉球既是產出漢詩文的“場域”,同時又是漢詩文文化流通的路徑。琉球知識人以中國知識人爲師,江戶時代的日本知識人又以琉球人爲師,出版他們的詩集。琉球人看重那些已經被人忘卻的、由中國地方知識人編集的童蒙書,將其引入教育教養體系中。於是這些書從中國傳播到琉球,又經琉球傳播到日本。陳元輔《枕山樓課兒詩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陳元輔是程順則的福州老師,康熙三十五年(1696),陳元輔編集的《枕山樓課兒詩話》由程順則刊行,雍正三年(1725)再刊。此書經琉球傳入日本,於江戶元文四年(1739)、文政元年(1818)以及明治十四年(1881)分別數次出版刊行。³³ 江戶時代後期至明治時代,日本盛行漢詩,《枕山樓課兒詩話》適應了那個時代,獲得了衆多讀者,成爲中國—琉球—日本文化交涉影響構圖中的典型片段。

(作者:日本鹿兒島大學法文學部人文學科教授)

33 參照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頁286。

引用書目

一、中文

蔣寅：《清詩話考》。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

高津孝、陳捷編：《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 年。

二、日文

（一）專書

上里賢一編：《中山詩文集》。福岡：九州大學出版會，1998 年。

小林春樹編：《東アジアの天文・曆學に關する多角的研究》。東京都：大東文化大學東洋研究所，2001 年。

川瀨一馬：《日本書誌學之研究》。東京都：大日本雄辯會講談社，1943 年。

木津祐子編：《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藏琉球寫本“人中畫”四卷付“百姓”》。京都：臨川書店，2013 年。

平凡社地方資料センター編集：《沖繩縣の地名》。東京都：平凡社，2002 年。

《竹翁傳》。鹿兒島：青潮社，1982 年。

沖繩大百科事典刊行事務局編：《沖繩大百科事典》。那霸：沖繩タイムス社，1983 年。

東恩納寛惇著；琉球新報社編：《東恩納寛惇全集》。東京都：第一書房，1978—1982 年。

武藤長平：《西南文運史論》。東京：岡書院，1926 年。

高津孝、榮野川敦編：《琉球列島宗教關係資料漢籍調查目錄》。宜野灣：榕樹社發行，綠林堂書店發賣，1994 年。

高津孝、榮野川敦編：《增補琉球關係漢籍目錄》。鹿兒島：斯文堂株式会社，2005 年。

高津孝：《博物學と書物の東アジア：薩摩琉球海域交流——》。沖繩：榕樹書林，2010 年。

國立國會圖書館編：《人と藏書と藏書印——國立國會圖書館所藏本から》。東京：雄松堂出版，2009 年。

球陽研究會：《沖繩文化史料集成 5・球陽・原文編》。東京：角川書店，1974/1982 年。

鹿兒島藩：《三國名勝圖會》。東京：西郷活版印刷所，1905 年。

新村出監修：《海表叢書》。東京：成山堂書店，1985 年。

(二) 論文

伊知地季安：《漢學紀源》，載《鹿兒島縣史料・舊記雜錄拾遺・伊地知季安著作史料集九》（鹿兒島：鹿兒島縣，2011 年）。

高津孝：《琉球詩課と試帖詩》，《鹿大史學》，1995 年第 43 號，頁 1—14。

高津孝譯；陳正宏著：《琉球訪書記》，載《東アジア海域交流史 現地調査研究——地域・環境・心性——》，2009 年 1 月，第 3 號，頁 220—227。

The Publication Culture of Ryukyu and the Ryukyu Anthologies of Chinese Poetry

TAKATSU Takashi

(Professor, Faculty of Law, Economics, Humanities, Kagoshima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residents of Kume Village of Ryukyu Kingdom are descendants of Chinese emigrants who moved from Fujian province in the Ming dynasty. Historically, Kume village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rade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Ryukyu, and they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cre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uch Ryukyu Chinese poetry. Anthologies by Ryukyu poets were published in Beijing and Fuzhou in China, and Kyoto, Edo, and Osaka in Japan. The present essay is a study of the publication culture of Ryukyu. It examines the publication activities of Kume villagers, especially the publication situations of Chinese poetry anthologies, recognizing and evaluating their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cultural exchange in the marine areas of East Asia.

Keywords: Ryukyu, publication culture, teaching and cultivation of gentry clans, anthologies of Chinese poetry